

## 5.5 联合国下设机构在其工作中对证据综合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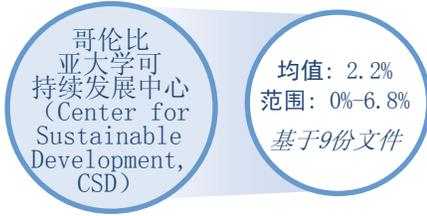
联合国系统由若干实体组成，并与一些附属实体合作。这些实体是关键的证据中介，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都依赖这些中介来支持知证决策。出于第4.4节所述的原因，全球最佳证据的综合（即证据综合）是理解已知和未知内容的逻辑起点，可由成员国将其与本土证据（例如，国家或次国家的数据分析）相结合。

2021年的一份报告对三个联合国实体（UNICEF因诺琴蒂研究中心（UNICEF Innocenti）、世界银行集团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以及三个联合国附属实体进行了分析，后者包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SDSN）、一个究中心（CSD）和一个研究协作网（EGAP）。分析发现，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其技术工作中使用证据综合的方式明存在重大改进机会：（4）

- 证据综合在关键文件中的引用比例较低（0.5%至17.0%），78份文件中有27份未引用任何证据综合
- 能力建设很少注重证据综合
- 支持证据综合或可靠指南制订过程的指南或政策很少
- 在这些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体中，UNICEF因诺琴蒂研究中心是唯一的积极支持者。

中介	证据综合占关键文件中所有引文的百分比	证据综合相关的能力建设工作	用于提出建议和证明决策合理性的证据综合相关指南或政策
----	--------------------	---------------	----------------------------





CSD支持巴拉圭的一个教育改革项目，该项目使用证据综合的方法为七个主题领域的教育改革工作提供证据 未发现



EGAP有一份制作Meta分析的指导文件 未发现

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分析。

2007年一项针对联合国实体（即WHO）的研究发现，尽管2003年WHO的指南支持摆脱对专家意见和非正式小组过程的依赖，但在制订推荐意见时很少使用证据综合和可靠的指南制订过程。(5) WHO迅速做出响应，成立了一个指南评审委员会，以支持工作人员制订循证指南，并在文化和行为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全机构范围的变革。(6)

2009年一项针对两个联合国实体（WHO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1）在8份出版物中，仅2份引用了证据综合；2）在14条WHO和7条世界银行提出的建议中，分别仅有5条和2条建议与证据综合中有效性主张的方向和性质一致；3）同时，也分别仅有10条和5条建议与有效性主张的方向一致。(7)